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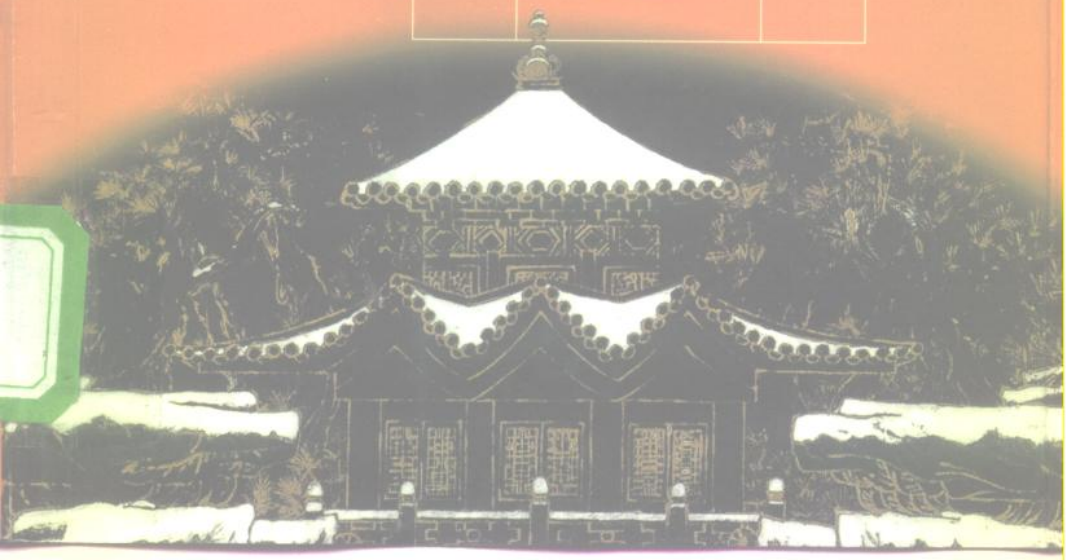
名人自述

沈钧儒 何香凝 黄炎培 于右任 章士钊 邵力子 程潜 冯玉祥 龙云 柳亚子 李济深 唐生智 张奚若 张治中 许德珩 李宗仁

杨里昂主编

爱国名人自述

20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20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杨里昂主编

爱国名人自述

花城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爱国名人自述

杨里昂 主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25 印张 1 插页 387,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0-2543-2

I·2186 定价:26.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 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编 辑 凡 例

- 一、本丛书是 20 世纪中国各方面突出人物自传、自述文章的选择辑，按类别分卷出版。
- 二、本丛书入选的名人，以其功业大体在 20 世纪完成者，目前尚活跃于各界的中青年人物暂不收入。
- 三、本丛书“名人”界定，依照惯例，为有杰出贡献、地位重要以及社会知名度较高三个方面而定，在编选过程中参考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工具书。一些符合上述条件的名人，虽留有这方面文字，但一时难以找到，只得留待以后补入。
- 四、本丛书入选的文章既注重史料性，同时又适当兼顾可读性。文字过于苦涩的材料不予入选。文章一般以语文体为主，个别用文言所作，因其人物重要，也适当收入。
- 五、本丛书入选的某些文章因其写作年代久远，某些观点与当前认识可能有差距，为了保存史料的真实性，本书编者一律不作改动，一般也不新加注释。
- 六、收入本丛书的一些篇什系选自版本书或长文，因本丛书篇幅有限，文字上有所删节。

目 录

沈钧儒	(1875—1963)
1	辛亥革命杂忆
何香凝	(1878—1972)
7	我的回忆
黄炎培	(1878—1965)
53	八十年来 (节选)
于右任	(1879—1964)
74	母 亲
章士钊	(1881—1973)
78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程 潜	(1882—1968)
90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邵力子	(1882—1967)
113	出使苏联的回忆
冯玉祥	(1882—1948)
126	五原誓师
龙 云	(1884—1962)
153	抗战前后
柳亚子	(1887—1958)
160	自 传

- 李济深 (1885—1959)
165 忆 母
- 唐生智 (1889—1970)
168 回忆第一次大革命
- 张翼若 (1889—1973)
184 回忆辛亥革命
- 张治中 (1890—1969)
210 六十岁总结
- 许德珩 (1890—1990)
238 我所经历的一段往事
- 李宗仁 (1891—1969)
245 回首话当年
- 蔡廷锴 (1892—1968)
262 “一·二八”率部抗日
- 陶峙岳 (1892—1988)
288 自 述 (节选)
- 包尔汉 (1894—1989)
303 我的自传
- 章乃器 (1896—1977)
307 七十自述
- 陈嘉庚 (1897—1961)
330 南侨回忆录 (节选)
- 屈 武 (1898—1995)
339 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
- 翁文灏 (1898—1971)
356 回顾往事

罗隆基 (1898—1965)

371 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

董其武 (1899—1989)

387 绥远“九·一九”起义回顾

史 良 (1900—1985)

402 我的生活道路

张学良 (1901—)

429 接见日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节选)

沙千里 (1901—1982)

446 我和救国会“七人之狱”

陈明仁 (1903—1974)

467 自 传

朱学范 (1905—1995)

504 我与民革四十年 (节选)

雷洁琼 (1905—)

520 血溅金陵忆当年 (节选)



沈钧儒 (1875—1963),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字未言, 号衡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法学家。浙江嘉兴人。清光绪进士。早年留学日本, 回国后先后参加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6年在上海领导文化界救国会, 从事救国运动, 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抗战后获释。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国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等职。

辛亥革命杂忆

我是浙江人。谈到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况, 还得从我在日本的时期说起。

清光绪末年, 我留学日本, 就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有所接触, 特别是和光复会往来较多。光复会著名人物如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 都是浙江人, 其中也有参加同盟会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 但由于我倾向革命, 跟光复会领导人章炳麟过从甚密, 所以他们的活动我是知道一些的。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在日本学军事, 准备回国后参加到军队里去, 有计划地进行武装革命。后来就发生了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和秋瑾在绍兴被害

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当时是震动全国的。

我回国到了浙江的时候，由于革命遭受挫折，表面空气沉闷，但实际上光复会中的重要人物都在秘密分头活动。他们跟浙东的台州、处州、金华各属的秘密会党有联络，在新军里面进行革命工作（当时浙江编练新军两标），新军中也有不少官兵参加革命。那时候，我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教员中颇多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其中就有周树人即鲁迅先生。

宣统元年（1909）阴历二月间，清廷下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宪政。十月间，各省成立咨议局。浙江咨议局议长是陈黻宸，陈时夏和我当了副议长。清廷的所谓筹备立宪，给了立宪派一种幻想。于是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发起联合各省的咨议局，在上海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派代表向清廷请愿召开国会。宣统二年（1910）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当时革命和立宪两派对国是争论不休，大家要我到北京去看看形势。我在北京呆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权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辛亥阴历四月间，清廷下诏书要把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送给帝国主义者。沪杭甬铁路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由江浙人民集股筑成的。一听到要收归国有，群情激昂。那时候各省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向清廷力争，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不久，武昌起义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情绪高涨。当时杭州驻有满人旗营，有相当实力。新军中参加革命的官兵跃跃欲试。革命党人从外地纷纷来杭州，秘密设立机关，日夜会商，着手准备。到了九月初十左右，一切布置都已就绪，决定十五日（阳历11月6日）拂晓开始发难。大家分配工作，我和陈时夏担任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和布告等。十四日夜半，

新军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配合了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敢死队，先向抚署和军械局的驻军进攻。巡抚增韞由后门逃走，当被擒获。攻军械局亦已得手。两标部队在城站会合后，各拨一部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上午，出安民布告，通电全国，宣告浙江独立。

革命军顺利地推翻旧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建立新政权，首先是谁来当都督的问题。革命军发动进攻时，只推定原宪兵司令部的军官童保暄为临时司令官，后来就由他用临时都督的名义出安民布告。至于正式都督，当时我们考虑到汤寿潜。汤寿潜是沪杭甬铁路局总理，住在上海。他在争回沪杭甬铁路的时候，在群众中建立了一定威信，但是他并没有参加革命，后来我们知道了他跟旗营的协领满人贵林（贵翰香）有深厚的交情，像这样一个人，原是不适宜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我们——主要是咨议局方面的人，竟认为非汤不可，在光复前两天（阴历九月十三日），我们就派陈时夏赴上海欢迎汤来杭州。十五日早上，我们又打电报给他，由陈献宸、褚辅成、马叙伦和我四个人具名，报告浙江光复情况，催他赶快来杭州。下一天，火车通了，汤寿潜于下午偕陈时夏等乘火车到达杭州，直赴咨议局，跟大家商议一切。

那时候围攻旗营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满人将军德济虽然主张投降，但是实际掌握军权的协领贵林仍然主张顽抗到底。这里有一件动人的事：有一个参加洪门会的工人张子廉（一说姓王，名不详），把旗营大炮的炮臼偷偷地拆了下来，使大炮不能施放，因此杭州城内避免了炮战的破坏。到十五日下午，贵林等又探得巡抚增韞已被活捉，革命军声势浩大，眼看无法顽抗了，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两名随从，向我军接洽投降。他要求我们纳降后不杀一个旗人，革命军首领在咨议局讨论结果，准如所请，约定十六日中午正式呈交军械清单。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到了十六日，贵林听说汤寿潜回到杭州，就说投降条款中不杀一个旗人的那一条须得到汤先生的保证，才肯呈缴军

械清单。原来那个贵林同当地豪绅有勾结，跟汤寿潜、陈黻宸都有交情，所以他有恃无恐，居然坐在咨议局里等汤寿潜到来。汤寿潜一到，他就对汤说了许多话，汤从他手里取过那张写满条款的纸来草草看了一遍，就答应了他。

十七日上午，才正式集会讨论推举都督。褚辅成提议推汤寿潜为都督，多数赞成，王金发（他是光复会会员，带领敢死队，配合陆军八十一标攻军械局驻军的）等少数人反对，以为汤寿潜过去怂恿浙抚张曾歃捕杀秋瑾，不应该推他作都督。最后仍然通过以汤寿潜为都督。汤于当天正式就任，以旧劝业道衙署为都督府。当天发布四个文告，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本年九月起，蠲免全省钱粮厘金一足年。现在看起来，蠲免全省钱粮厘金，只对地主豪商有利，贫农佃户得不到什么好处。

浙江光复的头几天里，一切都是乱哄哄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贵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经人告发，浙军司令部立派部队驰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支二千余支，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贵林和他的儿子量海当场被捕，解送司令部，受军法会审。当时我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参加了会审。我们问贵林：“投降条款中不是写的明白不得私藏一枪一弹，日后如发现所报不实或私藏枪械的，应处极刑吗？现在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什么说？”当即判决贵林父子死刑，就在咨议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当时人心大快，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过去携眷避往外地的，都纷纷搬回来了。

枪毙贵林父子的时候，汤寿潜适因事去上海，他一得到消息，下一天就回杭州，质问当时担任总司令的周承蒔和我，何以不向他请示。我们回答他说：此案人证物证俱全，用军法紧急处分，是我们的责任。汤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还想起另一件事。当时在杭州开设广济医学堂和广济医院

的英国人梅藤根，借口保护英国侨民，要求在西湖保俶塔一带圈地作为英侨民住区，像租界一样。我们一面向他警告，不许他乱来，一面派警察在保俶塔一带巡查。有一天，梅藤根邀我到他的家里，用茶点款待，还请我听他的女儿弹钢琴，喜笑颜开地说了许多恭维话，意思是要拉拢我，叫我同意他在保俶塔附近圈地。我严词拒绝了。

十月十二日（阳历12月2日），苏浙联军攻下南京。十一月初六日（阳历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国，到达上海。十一月十三日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时候，汤寿潜已经辞职，继任的是蒋尊簋。一月间，浙江成立了临时省议会，临时省议会制定了浙江省临时约法。议决了军政府官制及本省预算。我在那时候担任了教育司司长。蒋尊簋是浙江人，在广东做新军标统，广东光复的时候，他以新军标统暂任临时都督，后来粤省军民正式举出都督，他就辞职离粤。汤退蒋继，时在辛亥十月中旬，即1911年12月上旬。但其时朱瑞（他是光复会会员，原任八十一标代理标统）攻克南京天保城有功，凯旋归来，受到热烈欢迎。他那时候已经做了浙军军长，跟蒋有矛盾。以后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那时候在浙江已经可以看出苗头来了。

我记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事实。我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当时对于革命的认识是模糊的。今天想起来，浙江光复所以那么快地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迫切要求和热烈支持。但是，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又不依靠广大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那末，人民胜利的果实仍然会被夺去，革命势必逐渐变质，以至于完全失败。这是我们所应当接受的历史教训。今天纪念辛亥革命50年，回想我们在过去所走过的这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看看当前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

之下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真是既兴奋，又高兴。

本文选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



何香凝 (1878 -1972) 女。号双清楼主，广东南海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一，廖仲恺夫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妇女部长，国共合作破裂后辞去一切职务。1947 年与李济深等筹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著有《何香凝诗画集》、《双清文集》。

我的回忆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小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20 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

恺的亲兄懂得一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即1902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1903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濑寅藏，就请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语文。成濑寅藏对我的学习问题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会机，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仲恺和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年青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

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才。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达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为他们管理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谈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是停

止了。

1904 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梦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远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恺，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就被清政府逮捕后牺牲。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长知、寺尾亨和山田纯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敢同我们多所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留学生中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

1905 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